

春日观鸟正当时，恰逢五一出游旺季，正是邂逅飞羽精灵的好时机。抬眼望去，城市街巷里燕巢渐空，麻雀声稀；而野外自然保护区却喜讯频传——朱鹮从濒危边缘复壮至万余只，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实现翻倍。

这份“鸟世界”深度观察，带你读懂这种生态反差：我们身边的鸟类，到底是变多还是变少了？



麻雀燕子少了，朱鹮等珍禽多了 鸟儿王国，上演冰火之歌

主笔：于梅君

难觅踪影：身边的「鸟邻居」去哪儿了

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最直观的感受是：身边的鸟叫声似乎不如从前热闹了。这并非错觉，而是一个被数据证实的现实。

麻雀昔日曾“无处不在”，今朝却“难觅踪影”。

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990-2010年长期观测数据显示，北京城区内的麻雀种群密度在近二十年来下降近六成，同样趋势也出现在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。麻雀的减少，源于城市化带来的“三重打击”。

筑巢空间的丧失是首要因素。麻雀理想的筑巢点是瓦片屋顶、屋檐缝隙和土墙洞穴，但城市改造让这些地方不复存在——新建的高层住宅墙面光滑得无处落脚，密封设计则堵死了麻雀的安身之处。

食物来源的枯竭同样致命。以前农村晒粮，城里人家门口撒米都是麻雀的“免费食堂”，如今粮食集中储存，小区地面干净得连个瓜子皮都不留。与此同时，田地大量使用农药导致昆虫数量锐减。据研究，现代农业的化学防治已造成单位面积飞虫生物量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的18%，以虫为食的幼鸟成长率随之大幅下降。

噪音与光污染则构成隐形杀手。持续的车流噪音淹没了麻雀的叫声，干扰它们用于求偶和报警的交流；夜间照明扰乱其生物钟；而数量激增的流浪猫，则直接构成捕猎威胁。

燕子归期已至，为何“缺席”？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”——这首儿歌所描绘的画面正在现实中褪色。一项2017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，74.48%的公众认为燕子数量明显减少。科研人员曾在北京故宫周边进行路线调查，1964年记录到家燕32只，而2000年沿同一条路线调查时，记录到0只。

和麻雀一样，筑巢空间被现代建筑彻底“封死”，同样是燕子减少的核心原因之一。调查发现，在城市化率超过60%的地区，家燕的巢密度下降70%以上。食物链断裂同样致命。燕子是“纯肉食主义者”，一天要捕食数百只飞虫。农田里大量使用杀虫剂，不仅直接毒杀鸟类，更导致飞虫数量锐减，让燕子面临“断粮”危机。

气候变化则成为压垮燕子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的调查表明，只有不足一半的成年燕子能在第二年春天成功飞回。近年秋季，东北地区曾出现大量燕子因气温骤降而滞留死亡的事件。

喜鹊适应力虽强，衰退趋势未改。

喜鹊给人的印象一直是“聪明、强壮、适应力强”。喜鹊的巢通常筑在大树上，但随着适合筑巢的大树被大量砍伐，许多喜鹊不得不将巢建在低矮的小树上，鸟蛋被天敌发现的概率随之增加，也极易遭受人为破坏。

不过，喜鹊的城市适应能力相对较强。在一项针对北京居住区鸟类群落的调查中，喜鹊仍被列为优势种之一。这说明喜鹊在城市绿地保留较好的区域仍能稳定栖息，但农村地区的持续下降趋势仍不容忽视。

难逃贪欲：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

除了城市化带来的栖息地丧失，另一种更为残忍的威胁，正在将某些鸟类推向灭绝边缘——那就是人类的口腹之欲。

禾花雀从“餐桌常客”沦为“极危幸存者”。

禾花雀的遭遇，堪称中国鸟类保护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案例之一。仅仅在三四十年前，在广东、浙江等南方省份，禾花雀还是一种寻常鸟儿。每年春秋迁徙季，它们铺天盖地掠过稻田，被农民视为“害鸟”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它们曾是当地餐桌上的“家常便饭”，是食客眼里的“时令野味”“天上人参”。

正是这种持续数十年的捕食风潮，将这一庞大种群推向灭绝边缘。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统计，从1980年到2015年，禾花雀种群数量累计下降超过99%。2004年，它的评级还是“无危”；到了2017年，因数量断崖式暴跌，被提升为“极危”，距“野外灭绝”仅一步之遥。

2021年，新版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将禾花雀(黄胸鹀)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曾经餐桌上的“家常菜”，成为不可触碰的“生态禁区”。

禾花雀并非唯一被吃到灭绝边缘的鸟儿，它的“难兄难弟”同样在野蛮的食欲下挣扎求生。

东方白鹳全球数量不足万只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但在2023年，4名男子为“打野味”，用气枪在农田猎杀了2只东方白鹳，最终分别被判处4年至5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。

彩鹮曾一度在中国绝迹，2021年刚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但2022年5月，一只在四川现身，引来众多观鸟者的彩鹮，竟被人猎杀，原因仅仅是为了“吃野味”。此外，被不法分子冒充禾花雀贩卖的其他鹮类，也同样难逃捕杀命运。这些悲剧反复验证着那句“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”——鸟儿的命运，就在人类一念之间。



栖息地修复：朱鹮等「国宝」强势回归

当我们为身边常见鸟类的“退场”感到惋惜时，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，正在湿地、森林和保护区中展开。白鹤、青头潜鸭、黑嘴鸥、中华凤头燕鸥、朱鹮等多个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实现稳定增长。

朱鹮实现从7只到1.1万余只的“复活奇迹”。

朱鹮被誉为“东方宝石”，1981年被重新发现时全球仅存7只，野生种群栖息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。经过40多年持续保护，我国探索出“就地保护+人工繁育+野化放归”体系，截至2025年，全球朱鹮种群已增至1.1万余只，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扩大到1.6万平方公里，国内种群已分布到十几个省份。

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实现“五年翻番”。

中华秋沙鸭，这种距今一千多万年前第三纪冰川期残存物种，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，对栖息地水质要求极为苛刻。吉林省的监测数据显示，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已从2018年的不足300只增长至2023年的600余只，实现了“五年翻番”。

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。

广东2025年越冬水鸟监测中，东方白鹳、黑脸琵鹭、中华秋沙鸭数量，均是2024年数量的3倍以上。内蒙古越冬水鸟达16万只，仅赤麻鸭越冬种群就有13.2万只，占全球总数的60%以上；呼伦湖保护区鸿雁数量，从2013年不足600只增至2025年2万只以上。

濒危物种数量的回升，离不开栖息地的系统性修复。

在湖南黄盖湖自然保护区，“巡护+科技+共治”的创新模式，推动水鸟数量稳定增长，鸟儿种类已增至156种。

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，我国目前有鸟类1500余种，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六分之一。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，有4条途经我国，几乎覆盖我国全部领土和领海。

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徙通道重要栖息地，对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开展保护修复。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，三江源国家公园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。

冰火同源：鸟儿的命运，取决于人类

一边是常见鸟儿难觅其踪，一边是珍稀鸟类强势回归——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趋势，实则源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：鸟类的命运，取决于人类如何与它们共享这片土地。

朱鹮从7只增长到1.1万余只，中华秋沙鸭的“五年翻番”——这些数字告诉我们：当人类有意识地保护栖息地、修复生态系统、建立自然保护区、实施人工繁育和野化放归时，鸟类种群完全可以实现逆转。

国家林草局的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394种，“三有”鸟类达到1028种，受保护鸟类物种数扩大近50%。连续多年开展的“清风行动”，则有效遏制了非法捕猎势头。

而常见鸟类的减少，则暴露了日常保护的盲区。燕子、麻雀等鸟儿的困境恰恰在于：它们太“常见”了，以至于没有人专门为它们划定保护区。

珍稀物种往往栖息在偏远的自然保护区内，可以通过划定边界、限制人类活动来实施有效保护。而燕子、麻雀、喜鹊、白头翁等就生活在我们的房前屋后，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——是否在装修时为燕巢留一道缝，是否在阳台上撒一把米，是否减少使用杀虫剂，是否在高楼窗户上贴上防鸟撞贴纸……

国际鸟盟第八次全面评估显示，在11185个鸟类物种中，有1256个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，61%的鸟类物种种群数量正在下降。而在这场全球鸟类危机中，中国鸟类保护的“冰与火之歌”——有喜，有忧，有成就，更有挑战。

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终点，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不可逆的损失，而每一个物种的恢复，都是对人类努力的最好回馈。

当鸚鵡舞与燕语莺啼共同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时，才是真正的万物共生。而这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。